

利瑪竇書信集《上》

利瑪竇全集 3

羅漁 譯



羅
漁
譯

利瑪竇全集 3

利瑪竇書信集《上》

光啓出版社
輔仁大學出版社
聯合發行

利瑪竇全集 3

利瑪竇書信集《上》

譯者：羅 漁

發行人：羅光、袁國慰

聯合出版者：光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一〇七一八辛亥路一段二四號

電話：(〇二)三四一四九二・三四一六〇二四

郵政劃撥：〇七六八九九一一(光啓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〇八四號

輔仁大學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五一〇號

電話：(〇二)九〇三一・一一二二七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二二號

郵政劃撥：〇一五二六四九一七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一七〇號三樓之3

電話：(〇二)三九六〇三五〇・三二二三六二七

定價：一八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Complete Works of Fr. Matteo Ricci, S.J.

Vol. 3, Letters(I)

translated by Luo-Yu.

編者序

內容大意：1. 利瑪竇的書信及其「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之間的關係。2. 利氏的信函藉手抄卷宗爲我們保留下來。3. 由出版者負責印刷利氏有關資料文獻。4. 從利氏的書信可以看出他精神的偉大、胸襟與善心，這是我們從其書信所獲得的最大利益。5. 利氏在華的傳教夥伴和他們與利氏有關的信函：(a) 羅明堅。(b) 巴範濟。(c) 卡布拉列。(d) 麥安東。(e) 石方西。(f) 龍華民。(g) 李瑪諾。(h) 熊三拔。6. 一六〇一年教宗西斯篤五世致大明皇帝國書與利氏的備忘錄。

1. 利瑪竇的書信及其「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之間的關係

時間吞噬侵蝕不知多少珍貴文獻，利氏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手稿也不例外，唯獨留下他的書信。雖然損失嚴重可悲，但並非不可補救；因爲他的書信集可謂是撰寫「天主教傳入中國史」的資料淵源，所以其內容和「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幾乎相同。但並不因此便肯定說：認識利氏和他

在華工作夥伴的著作只有書信，或只有日記，總之兩者皆加以保留，似乎已成爲多餘的，或至少已沒有什麼特殊價值。因爲在信函中我們不能獲得更豐富而廣泛且井然有序的資料，例如在「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卷一所敘述有關中國的位置、習慣、法律、宗教及其它，或者不如卷五中敘述鄂本篤修士的著名旅程那麼詳細，這一切是書信集不能提供的。但有許多事件的特殊性質，又只能在書信中找到。因此雖然兩者在時間的背景有時不一，目的不一，但兩項資料給予同樣的類型。利氏每年依會規應給會方撰寫報告，尤其應給會中的上司或其他有地位的神長通信。這些神長們自然不會把他的信件隱藏起來，視若不存在。利氏有時也給他的家人親友通函，或給他相信尚活在人間的親友寫信，爲使他們知道他在遙遠的中國傳教十分艱辛，暫時把人間溫情放置一邊，但其內心並非毫無親情。「天主教傳入中國史」是他晚年的作品，大半的事件是多年前發生的。起初他撰寫此書，原有意把他二十餘年在中國傳教的狀況與經過，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作一完整的報告，且不假他人之手，有意出版成書，供後人閱讀。果然這部書受到羅馬的重視，在他去世不久就實現了。

書信集與「天主教傳入中國史」給我們提供不同的資料：前者以書信體敘述，其內容爲數月間所發生的事，是狹義的歷史資料；後者撰寫的時間雖短，而所敘述的範圍包括很廣，因此絕不能說有了一種，另一種便爲多餘的。因此利氏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與書信集之間，並非一個可以代替另一個，而是相輔而行，互爲表裏。因此當一九〇九年我發現利氏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後，馬才拉塔利瑪竇研究委員會（Comitato Maceratese per studio di P. Matteo Ricci）要

求我用它的名義出版，我就告訴他們最好也把利氏的書信集同時整理出版，在這方面我已收集不少，是從「義大利歷史檔案庫」(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發現的。在這裏應該感謝我的至友，該庫主任德耳·威濟奧教授(Prof. Alberto Del Vecchio)，有他的協助，方獲成功。此建議實現之後，終於可以讓義大利著名漢學家諾產提尼教授(Prof. Nocentini, il Sinologo)感到慰藉了，因為他不止一次以沉重的口吻感嘆利氏作品的喪亡或遺失，這並非無的呻吟(見所著「首位漢學家利瑪竇」Il Primo Sinologo P. Matteo Ricci序言)。

2. 利氏的信函藉手抄卷宗而留傳下來

我們於是便著手製定工作的綱領。當這位偉人離開人間，返歸天鄉之際(一六一〇年)，他所寫的書信，相信很多應當還存在。可敬可愛的利瑪竇爲上主的光榮而生活在遙遠的中國，和歐洲完全隔離，和他會中的上司們與會友們之間的接觸，只有藉書信一途而已。他本人也告訴我們，他們中大半每年都給會方報告一年工作的情形。例如利氏於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三日致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其中一段寫道：「已兩年了，我以能收到您的信而感到快慰。雖然您忙於會中更重要的事，但仍收到我的信，因爲每年我都給您寫信報告傳教工作的進行，以便保存下來。只可惜有些信不會達到您的手中云云。」利氏在同年同月在致高斯塔神父的信中則謂：「今年不曾收到您的信，恐怕您也不會收到我的，您要知道並非我不寫，因爲每年照例我都給您寫，只是我的信不會到達您的手

中罷了。」可惜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我們只找到六封而已。我們有記錄，我們找到他的書信僅二十九封，但這也是夠讓我們看出資料的豐富，雖然所保存下來的並非每年皆有，實際上連其它與利氏書信有關的書信，合計有五十四封，其中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是由一五八一年到一六一〇年，至少應有三十封，而今保存下來的只有十三封。這些保存下來的包括的範圍很廣，其中遺失的也不少，如一五八二、一五八七、一五八八、一五九〇、一五九一、一五九八等年所寫的信，便不曾找到，就是十七世紀初期的信也有遺失。現在找到的，如前言計有五十四封，其中十一封是曾經出版過的（八封全部、三封局部）。這些出版過的與不會出版的毫無懷疑地皆是出自利氏之手。其中三十一封為利氏手跡，是由耶穌會總會檔案庫、愛包蘭塞圖書館（Biblioteca Eborense）與芒都阿國立檔案庫（R. Archivio di Stato in Mantova）共同貯藏，另外尚有二十二封是抄寫的，或至少忠實地抄自原文，一切幾乎同樣視若利氏的親筆信函。

對這些抄寫本（Apografi）是由於利氏城人對利氏的聲譽鵲起而方有此舉。這是我們應當簡略給讀者說明的。

除掉少數幾封——即第1、1a、2b、4、11、21封外，直到十八世紀，方有人因對利氏非常景仰，有意收集並編輯這位偉大使徒的書信集。因此產生三種「利瑪竇研究集」（*Sillogi*），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第一集保存在馬才拉塔市立圖書館中，第二手抄卷宗E³，第二集保存在耶穌會總會混合集卷中。第三集為安東尼·利啓·里加爾狄（Marchese Antonio Ricci Riccardi）侯爵

所有，體積相當大。

對此三集者略加敘述：

馬才拉塔手抄卷宗收集利氏書信十二封：即本書第十三封，利氏致父書，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日撰於韶州；第十五封致父書，一五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撰於韶州；第十四封利氏致阿桂委瓦會長書，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撰於韶州；第二十封利氏致班契神父書，一五九五年十月七日撰於南昌；第二十一封 a 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一五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三封利氏致富利卡提神父書，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二日撰於南昌；第二十四封利氏致其弟安東·利啓書，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三日撰於南昌；第三十三封利氏致其弟奧拉濟奧·利啓書，一六〇五年五月十二日撰於北京；第三十六封利氏致朱利奧與吉羅拉摩·阿拉列奧尼兄弟神父書，一六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撰於北京；第三十一封致父書，一六〇五年五月十日撰於北京；第三十二封致高斯塔神父書，一六〇五年五月十日撰於北京。這十二封信分別收集在六卷宗中，其中四卷宗各佔十二頁，一卷宗佔十頁，另一卷宗佔八頁，合計六十六頁，頁面積 23×17 公分。這十二封信在 31a—32a 頁中，我們找到龍華民神父致馬塞利神父書中摘錄的一段，一五九九年九月二十日撰。再向前有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菲利普契神父（P. F. Saverio Filippucci）的一封信（三十七A—三十八A頁），最後爲利瑪竇答建安王多癩「論友誼」（De Amicitia），再由利氏從中文譯爲義大利文（五十五A—六二A），並在最後一頁與六十

四頁的餘剩部分，我們找到阿拉列奧尼神父的短評，於一六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送給一位同會兄弟，對所言利氏的油畫像懸掛在耶穌會一座會院的客廳中，無疑地是指羅馬耶穌堂會院而言。本集於十八世紀末葉，和上言耶穌會總會混合卷宗裝訂在一起，即和利氏其它著作，也就是更古的作品，與熊三拔神父的報告同時期的著作裝訂在一起。此外尚有同會兄弟道列良神父（P. Pier Giuseppe d'Orleans）用法文所寫的「利瑪竇傳」，後由安東尼奧·利啓·里加爾狄侯爵（Marchese Antonio Ricci Riccardi）把它譯為義大利文，並由騎士德拉皮格納（Cavalier Della Pegna）對此譯作加以評語。

全部著作出自一人之手，雖然初讀時，由於筆法不同，好像有兩人執筆似的。這唯一的資料出自修養極深，對歷史又有特好的拉高馬西尼神父（P. Girolano Lagonarsini）的手筆。

第二集也與他有關，即耶穌會總會所有。其中也有馬才拉塔圖書館所藏的。最前七封與馬才拉塔收藏的順序類似，但又不全相同，因為其中一件或多件利氏時代的文獻與耶穌會歷史有關的其它文獻以時間交互混列，其餘五封置在其它地方：即排為第八封致高斯塔神父書，本書排為第三十二封；排列為第九封致父書，本書排為第三十一封；排列為第十封致兄弟奧拉濟奧書，本書排為第三十三封；排為第十一封致阿拉列奧尼昆仲神父書，本書排為第三十六封；排為第十二封致安東·瑪利亞兄弟書，本書排為四十二封。正如馬才拉塔手抄本的前言，同樣這個抄本的前言都是拉高馬西尼神父以極清晰可辨認的字體撰寫在八合頁之上，有時也寫在一整頁上。紙面積為 20 × 14 公

分，與十七、十八世紀的文獻，其中大半與耶穌會有關的合訂成一書；至於先寫前言或先裝訂尚不能肯定。關於利氏書信雖由他人手抄，但皆經拉高馬西尼神父校正過，從邊註上可知，如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利氏致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與一五九六年十月十八日致富利卡提神父書便是。

他肯定的說，假使這兩研究集不是一個抄錄另一個，兩者必定來自同一淵源，因為它們內容與秩序都完全一樣。現在要談談上言兩研究集所來的淵源問題。試問這淵源是否原文？抑源自某些手抄本？除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二日致富利卡提神父書外，因為在上面拉高馬西尼神父清楚注釋謂：「本書信抄自原文。」所以無疑地它源自利氏手跡，其它十一封信，雖然無外在顯著的證明，但仍然可視為抄自利氏原始手跡。無論如何，基本上可以確定它們是來自同一淵源。即便缺乏明顯的證明，實際上並非如此，仍然該當說拉高馬爾西尼神父所謄抄的文獻，不但由於字體，而且也由於語氣的劃一，可以完全相信，全部確是來自不折不扣的利氏手跡。此外尚有一個證明加強我們的信念，即我們以利氏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與拉高馬爾西尼神父的手抄本相比，可以清楚看出兩篇文字完全相同。

茲簡單介紹安東尼奧·利啓·里加爾狄侯爵所有的第三研究集。

它是十九世紀初葉的產品，此卷由五十七張 26×19 公分的羊皮紙所編成，不過最後四頁是空白的。這些文獻完全抄自馬才拉塔市政府圖書館的卷宗，其中不只載有利氏的十二封書信，而且尚有抄自上言其它手抄本之文獻。由此手抄本發現有兩封書信，是這位顯貴的侯爵於一九一〇年首

次公佈的，是在他這位光耀的祖先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期間，出資印刷一本裝訂精美的紀念專集中發表的。

3. 由出版者負責印刷利氏有關文獻

利氏的手跡經過四個世紀而傳到我們手中，資料之多是出乎我們的想像與希望之外。我們所存有關他的信函，或是原始文獻，這差不多全是出自他的手筆，或是副本，是直接或間接抄自原始文獻，無不把其最具真實性的特徵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一切又端賴出版家的貢獻，不但給我們提供更多、更純真的利氏著作，而且把重大的手民之誤修正過來，並把重點、綱目列出，以求醒目，其下並列詳細的注釋，這一切為研究利氏的學者不消說提供頗多的方便。

以此為標準我完成了這項工作。此外書信集又較「天主教傳入中國史」更為我們提供一個嶄新且值得注意的方向，即常出現在利氏書信中的人物，除總會長外，尚有其他耶穌會的上司、好友、同事、他的父母、兄弟、還有不少僅提姓名的親友，這後者不能永遠被遺忘，也許有人願意知道究竟他們是誰？他們有什麼歷史背景？為滿足上述人士的希望，便不得不去各有關地方，尤其耶穌會羅馬總會檔案室與馬才拉塔市立圖書館考察摸索了，以求對有關人物的背景、職務與貢獻有所了解。

4. 從利氏的書信可以看出他精神的偉大、胸襟與善心，這是我們從其書信所獲得的最大利益。

一篇文獻經過校正、注釋之後，更容易讓人相信，也達到出版的目的。由利子的信函，我們對於在中國傳教的艱辛，有更新的瞭解，由他開始，勇往直前，領導這件龐大辛苦的任務，將近三十年之久。「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在這方面似乎給我們更詳細、更好的紀錄，而由書信只能間接的找出這位中國使徒超然精神的偉大。在「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中，利氏以天生的純真，描寫自己與同伴差不多三十年之久在中國的辛苦，他設法隱藏自己；有些情節不能再隱藏時，他便以寬宏大量的心胸敘述，從不故意宣揚自己，所以從「天主教傳入中國史」看利氏，可說僅是閃光一現而已；但在書信則不然，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利氏本來的真面目，他的思想、他的偉大與其極甘飴的溫和。

其書信的許多情節，把利氏特殊的稟性完全顯露出來，也顯示他是多麼值得驚奇與可愛了。尤其在他致往日羅馬時代的長上，如羅馬學院院長馬塞利神父(P. Masselli)與初學院長德·法比神父(P. de Fabi)書以及致同鄉又同會高斯塔神父(P. Costa)，致父、兄弟安東·瑪利亞參議司鐸 Canonico Anton Maria Ricci)和奧拉濟奧以及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等，又顯示他是位多麼重感情、富人情味的人；同時也看出他以兒子的純樸，有情有愛地對待耶穌會最高的領袖——總會長。當他尚在臥亞時(一五七八—一五八二)，獲悉阿桂委瓦當選總會長，立刻給他去信恭賀，表示服從擁護，孺慕之情流於紙上。僥倖這封信到達了羅馬，不似其它利氏的許多信在途中遺失，而因此有許多年無他的信存在。當時他方三十歲，但已具有非常人所有的卓越判斷與遠大目標，可預見他將是天主所揀為打開中國大門傳播福音的人，使福音在中國紮根而茁壯。他以特別謙虛符合自

己身份的言辭，對教會新進皈依的國家所產生的微妙問題，向會中的最高領導進言：即耶穌會印度省的上司們方開始一種新的措施，就是不讓印度籍的大修士攻讀哲、神學，而只教他們拉丁文與良心問題解答而已。此舉引起年輕剛晉鐸的利瑪竇不平，他看出這樣訓練神職，有其極不良的後果。

從利氏致耶穌會最高領袖和其他上司書，而後再積其多年的經驗，使他成爲一位十分優秀的傳教人才。到處可見他睿智處世的才華。在他辛苦等候十二年後，他獨自思考，又與遠東視察員范禮安神父商量後，終於決定從衣僧服而改穿儒者服裝，就在這年（一五九五年十一月四日）致總會長神父書，可以看出他無論大小事項，皆向上級請示，要求批准；除此外，他料事正確，對重要的傳教事業當然十分攸關，同時他對教會的進步，教友的增多，又採極謹慎的態度，他在書信中甚至採「用鐵腳」（見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三日）致總會長書：「我們只有用鐵腳往前邁進。」他在去世前一年，致遠東省副會長巴範濟神父書（P. Francesco Pasio），可說給我們留下一封不朽的傳教文獻，即確實地了解中國傳教的困難和應當採用何種方法，方能達到這卓越的目的。他的判斷差不多半個世紀幾乎不曾變更，後來的傳教士並非心胸不寬大，也非勇氣不如利氏，但似乎缺乏利氏的先見之明，所採用的方法也不夠明智，不能勝過利氏。

正如他致總會長和其他上司書，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卓越，睿智出群，在致家人與同會兄弟們書又可看出他富於感情和人情味的一面，例如他爲表示感謝昔日羅馬學院院長馬塞利神父，所用的詞句是多麼富有情感與孺慕之情，他寫道：「我遠離我肉身的父母（*Secundum carnem*）固然感

到難受，但遠離您使我感到的痛苦更大。」幾年後他又給這位老院長寫信道：「基於服從我來到這裏，也感覺十分愉快。但當我一起想起您，想起我同您在一起的黃金歲月，我的眼淚就忍不住掉下來；您也想不到從前我生活在您、其他神父與可愛修士們的愛護之下，和目前生活在衆多教外人之中有多大的分別啊！希望您給我慰藉，此外天主既然從我母親懷中將我提出，讓我飛到這麼遠的國土，希望祂賜我一雙翅膀，不要跌入深淵裏，也用祂的雙肩託著我，給我協助……」

已經快三十年了，當他寫這封信時。由於路途遙遠，他不知道馬塞利神父已於六個月前去世，但也可看出利氏是位多麼重感情的人，雖然他們分手三十多年，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老院長。

「我擦乾眼淚後，給您寫這封信，想起和您相隔這麼遠，不能常聽您的教誨；在緊急關頭時，又不能及時得到您的指示，我感到痛苦不堪。但我也因有您的祈禱之助而感到安心。您曾給我幫過大忙，我深知您將還會繼續這樣做，使我這個重大的任務能有豐碩的成果，這個艱苦的任務好多年落在我的肩膀之上。」

利氏用同樣富有感情的詞句，對他的初學院院長德·法比神父表達謝意與孺慕之情。「我在這裡已許多年，從不敢把您忘記。」利氏於一五九二年十一月給這位神父寫信這樣說道，也請他原諒他所犯的重大過失，即不曾常給他寫信，欠他的太多太多了。爲補此一缺欠，他便立刻給他寫信，並把他當時內心的感受，一併向老院長申述一番，同時我們得以獲悉利氏內心的狀況，如殷望爲主殉道，作爲辛苦多年而效果不彰的懲罰，或讓人羨慕的永冠。他寫道：「假使中悅至尊天主的話，

以一個幸福的死亡來結束我的生命，正如我的好友羅道爾富神父（P. Rudolfo Aequaviva）在印度致命所享有的。啊！我的神父！那爲您昔日的這位初學生該是多麼幸福啊！」

他爲那些和他沒有特殊關係，應當感謝的會友神父們寫信時，也常用極友愛的詞句撰寫。例如他稱馬費伊神父（P. Maffei）給他來信，使他獲得莫大的安慰，因爲他是利氏在主中至可敬可愛的人，永遠不會忘懷的人。他也不斷給他去信，報告種種好的消息，希望不會打擾他，給他找麻煩。有時他寫道：「至少該給你寫幾行，你可以唸一遍，再重覆幾遍便算是我給你寫了一封長信。」他致同會兄弟富利卡提神父（P. Fuligatti）和其他在義大利的會友寫信時，同樣用極爲溫和、充滿友誼的語氣撰寫。「假如以我個人的興趣與嗜好，和您交談從不會感到厭倦，因爲我們相隔天南地北，也只有用書信互通情款了，但因爲每年我都給全體每位至少寫一封信，故應當把時間分配得當，尤其給我的朋友們寫信時，往往不知不覺中夾雜其它語言，本是用義大利文寫，竟然在其中德文或其他國語言出現，對此相信全體朋友都會原諒我的，我想我爲愛天主之故而已成爲野蠻化外之人」。雖然利氏聲稱他已變成化外之人，但仍顯示他感情豐富的一面。他告訴我們，基於他生活在距離歐洲遙遠的中國，可說與其它世界完全隔絕，感到同會兄弟遠離他，如再收不到他們的來信，便在生活中感到無比的孤獨，因此每當收到、拜讀他們的信時，無不老淚縱橫，把信從頭看到末了，一再重讀。

他的熱腸與富有感情，並不因年齡增長而有所減弱。「我的兄弟，我們相距眞遠。」一五九五

年他致班契神父（P. Benci）書這樣寫道——「在現生我們再見的希望是多麼小啊！但是我想正因為我們身處的國土彼此相離這麼遠，而我對你的愛仍然有增無減，希望天主正因為在這個世界我們彼此能再看見的希望越小，那麼在來世光榮裏，能再相會的可能性會更大。」

利氏於一五九六年給他做司鐸的兄弟安東·瑪利亞（Anton Maria Ricci）聲稱，他對兄弟的愛，不但不因他在天的另一邊就減弱，反而較以前更為熾熱。他囑咐老父基於愛應常和他通信，或讓兄弟們代寫皆可（按利氏計有兄弟八人，妹妹四人）。當他給同鄉又同會好友高斯塔神父（P. Costa）寫信時，要求常紀念他，並對祖國義大利的近況多多給他介紹，他既生為義大利人，理應對它有所關懷。他給老同學巴西奧乃伊神父（P. Passionei）寫信說：「我愛你、想你，不比你遜色。」

因此對利氏的內心良善，態度客氣，友情味濃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家庭、對同會兄弟、對朋友、親戚和對國家的情感是如何地深厚，同時也可看出他心胸的偉大與所遭受的折磨，尤其可以發現利氏從何處吸取力量去滋潤前者，又用何種妙藥醫治後者。我們常聽到利瑪竇神父在中國如何致力於宣傳福音，但並非以快速的步伐向前邁進；他是如何地謹心慎微，似乎不敢冒險嘗試集體的皈依運動。雖然他說話溫和，但意志非常堅決，並以莫大的毅力與勇氣，藉他中文的著作逐漸贏得中國人的景仰與佩服，因此對中國人歸化信仰基督，我們不該懷有猜疑的念頭，他遭受的差不多與公開的攻擊無異說是可怕幻覺的犧牲者。對他誤解批評的人，有印度會省、遠東